

目 录

一、阳春电影事业发展史……………区祝贤(1)

二、阳春宾兴农校……………刘时奥(7)

三、抗战前的阳春留省学会……………刘文昭(9)

四、糯米石麻疯村惨杀事件……………林光、蔡李荣、荒芜(11)

五、苏广入山概述……………永宁區志编写组(13)

六、抗日时期流徙合水圩的四邑难民……………洪荒忆述(14)

七、抗日时期春湾镇的难民惨境……………春湾镇张剑雄(17)

八、我是走日本时来到阳春的
 陂面陈金兰(女)口述
 ……………陈世金、欧亚整理(18)

九、阳春县建筑业发展概况……………刘苏、林德明(21)

十、历史悠久的黄牛头罌煲窑……………陈世金、欧亚(24)

十一、合水辣垌石灰……………~~林光~~宣(25)

十二、阳春解放前后的交通运输概况……………杜岳 陈森(27)

十三、新春公路与利民运输公司…：……………王敬崇(32)

十四、阳春解放前后邮政事业概况……………~~陈国任~~任(33)

十五、封面设计……………陈略

十六、封面说明

阳春电影事业发展史

区祝贤

电影的诞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我国首次出现电影是在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格致书院放映，内容是介绍各国风土人情和历史及地理的记录片。而阳春第一次放映电影片则是在一九三九年。当时广东省民众教育馆的莫廷琛在省拿回一套内容是体育新闻的电影拷贝，在春州文社前（即现在的县委大礼堂和小礼堂之间的广场）的民众会场放映。从以上史实看，阳春出现电影要比我国上海第一次放电影晚了四十六年。

一九二八年，有声电影问世了，当三、四十年代之际，我国各城市已普遍出现“有声电影院”，而当时阳春放映的第一部电影还是属于默片电影（电影发展的初级阶段，是有影无声的拷贝，没有声带装配，要靠放映员通过麦克风进行配音或作同步解说，这种影片称作默片）。解放前阳春既无电影院，又无流动放映队，只是偶尔有人带进一些默片在县城放映，尽管这样，阳春人看默片的机会也很少，这说明了当时我县电影事业落后状况。解放后，阳春放映第一次有声电映片，是在一九五一年七月，由省电影队放映四零四分队在服务社放映《白毛女》映片。我县文化生活设施不断改善。现将新中国成立后我县电影事业发展的情况分述如下：

一、县城电影院的建设及其变迁：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经济还很困难，县委就着手关心人民群

众的文化生活。当时文化活动工作大部分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负责组织和发动。粤中团工委于一九五一年，指示各县团工委要筹办青年电影院。我县经县委批准并指派团工委李希策同志负责筹办电影院工作。经多方筹备，决定成立“阳春青年电影院”，影院院址定在原“阳春新生活服务社”做放映场。电影院的放映场，就是利用于一九四〇年兴建的原“新生活服务社”的大厅。六百个座位也是原有的旧木制排椅。前楼是电影院办公室。放影设备是新会青年电影院转让给阳春的三十年代出厂的英制35毫米百乐放映机。该机原是默片机，改装后才能放有声电影。该院配有发电机自行发电放映。“阳春青年电影院”于一九五二年九月正式开幕，影院的人员编制十一人，李希策任经理。青年电影院初由县团委主管，至一九五四年才移交给文化科主管，改为“阳春人民电影院”。

一九五九年阳春阳江合并为两阳县，“阳春人民电影院”与“阳江人民电影院”进行机构合并，原阳春人民电影院的放映设备留下春城，改为“两阳电影院春城分院”，保留五名职工，设一负责人维持日常放映业务，经济收支向县电影院报账。

一九六〇年由于县城转移到阳江，春城分院经常上座率很低，人民剧场也很少演戏。因此，原来的电影院关闭，将红旗路的人民剧场改为影剧场兼营电影业务。

一九六一年两阳分县后，恢复原阳春县电影院的建制，仍用“阳春人民电影院”之名。

随着形势的发展，原电影院六百个座位已不能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了。县委决定拨出专款、并利用潭寮煤矿下马的一些旧材料，于一九六四年将该建筑物改建和扩大。使观众座位达到八百

个，座椅改为铁脚折椅，但电影院整个前楼门面仍保留着旧“服务社”的原貌。

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开始后，为了精简机构，把人民电影院与“人民剧场”合并统一领导，人员统一调配，对外仍挂两个牌子，各司各职。

一九七四年原“服务社”改装的电影院已变成危房了，不能继续使用，将旧电影院关闭。在关闭期间，人民剧场改为影剧场，负责电影的放映工作。后经县委决定重新建一个现代化的电影院，拨出专款并组成基建班子筹建。

经过多年的基建工作，于一九八一年二月落成一座面积1500平方米，能容纳一千四百多名观众的现代建筑物——“阳春电影院”，在龙湾河故道边屹立起来了。新电影院的建成，标志着我县电影事业向现代化迈进了一步，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大大提高了。为了满足广大群众对文化的要求，于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阳春电影院在附城礼堂与附城公社合办一个“附城电影院”。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又与钢铁厂合办一个“春光电影院”。

二、农村电影放映网的建立和发展：

解放后我县农村电影网的建立也是从零做起的。

一九五〇年起，广东省农村电影放映队第404分队（16毫米机）曾来我县流动放映，配合土改运动，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一九五六年该队才下放归阳春县管理。

一九五七年，我县新发展两个农村放映队，购置16毫米放映机两部，加上404队，共有三个队，分别编为阳春农村电影放映第

一、第二、第三队。每队编制三人，各队的放映范围如下：

第一队负责圭岗、永宁、附城、岗美等区。

第二队负责八甲、三甲、双濠、河口、潭水等区。

第三队负责河壩、石望、松柏、春湾、陂面、合水等区。

在此同时，省总工会电影放映队（35毫米大机队）也在我县开展放映活动，并下放归我县管理，负责厂矿及春湾、合水、潭水、三甲四大圩镇的放映。

各放映队按分工范围定点巡回放映。此时，全县农村放映点共有230个，农民看电影的机会也多了，文化生活得到改善。

一九五九年两阳合并，除了由县保留一部份放映队之外，其余按大公社编队下放给公社管理。其中春湾公社电影队负责河壩、松柏、石望地区的放映。圭岗公社电影队负责圭岗、永宁地区放映。三甲公社电影队则负责双濠、八甲地区放映。县属两阳电影第九队则负责合水、附城、河西、岗美、河口、双捷、潭水、马水等地区的放映。这时，电影的普及放映已达到高潮，平均每个放映点一年放映六次以上，农民可以普遍看到电影了。

大跃进年代浮夸风盛行，也影响到电影队伍。曾经出现过“电影放卫星”的口号。上面追求数字，放映单位则单纯任务观点，片面追求场次以致电影队通宵达旦地工作，并通过行政命令强迫群众看电影。同时，还创造了所谓“白天田头放映电影”的“先进经验”，向领导部门报喜。但由于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客观规律的做法，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很快就纠正过来了。

一九六一年两阳分县了，阳春分得的电影设备，除了恢复“阳春人民电影院”所需的设备和器材之外，还有16毫米电影机两部，35毫米影机一部，也就是领回分县前原有的设备。合并期间发展的

机队一律归阳江县。分县后自筹购买3.5毫米影机一部，共有四套设备，分别编为电影一队、二队、三队、四队。以后逐年增设了六个队。计有：一九六二年增加的第五队、第六队，一九六四年发展了第八队，一九六五年“四清”期间发展了电影科教队，编为第九队，一九七〇年发展第十队，一九七三年发展了第十二队。队伍的建设 and 扩大，为电影的普及放映打下了物质基础。

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电影也和舞台一样，前十七年的作品均被禁锢，能够在银幕上与观众见面的只有八个样板戏和部份新闻记录片。因此，售票率有时很高，但观众入座率都不高，甚至每场放映时，观众只是寥寥无几。

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银幕上也随着出现了一个真正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央决定把禁锢多年的电影节目逐步开放，特别是一九七八年电影上座率空前高涨，可算是电影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县电影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新的形势推动下，县办的十二个放映队虽然收缩或下放给区办，但由于发挥了区、乡办文化的积极性，出现了县、社合办的电影院二个（春湾、合水），区办的集镇电影院二个（三甲、潭水），电影队有区办的、乡办的，甚至私人办队的也有。电影队像雨后春笋一样，全县从十二个队发展到六十多个队，电影放映场次超过历史水平。这支队伍在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电影事业管理机构设置的设置。

五十年代由于电影放映单位不多，电影管理机构只有地区才设

置电影管理站，各县电影队业务上的管理如排片、机修、培训等工作都归地区或省直接管理。我县没有设置专门管理机构，只是由文化科指定省404分队长领导统管全县三个农村电影队。

一九五九年底两阳合并后，电影事业发展了，队伍也壮大了，随着形势的需要，在文卫局的领导下，成立了“两阳县电影管理站”，统管全县电影业务，经济上独立核算，全县农村电影队向县站报帐，县城电影院保持独立核算。

一九六一年分县后仍沿此制。

一九八一年根据上级指示，将电影管理站改为“阳春县电影公司”，领导管理本县包括农垦系统、武装部的电影放映单位及电影发行放映业务，使电影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电影公司受县文化局和市电影公司的双重领导，下设放映、管理、宣传、发行、财会、修理、器材等六个职能。国营电影放映单位（包括电影院）由电影公司直接领导，统一经营管理。

目前全县已拥有35毫米放映机14台，16毫米放映机44台，8.75毫米放映机12台，县城有电影院两间（其中一间是影剧院），集镇电影院有四间（春湾、合水、三甲、潭水），区办电影队十一个，乡办电影队（包括私人办队）四十二个。工矿、厂、场办电影队十三个。这支队伍在城乡大大满足了人民对文化生活的需要，在质量方面，也赶上了先进地区水平。阳春电影院已安装上空调设备，放映光源也取用氙灯新光源。全县电影放映单位已有95%以上实现光源改革，取用氙灯、或钨灯、锡灯等新光源，淘汰了炭精、普通灯泡等旧光源。声光质量得到提高，改善了群众看电影的条件。我县人民现在不但能看上宽银幕电影，也能看上立体电影了。

阳 春 宾 兴 农 校

刘时奥

阳春宾兴初级农业技术学校，创立于一九四四年秋，校址在县忠烈祠（现在的县供销社日杂公司新风门市部附近）。当年招收初级农艺专业学生两个班一百名（解放前的正规学校，每班学生都在五十人以内）。学制三年。一九四五年以后，每年都招收春、秋季初农生各一班。到一九四九年秋，又开始招收高级农艺班，全校高、初农学生共达二百多名。后随着学生增多，原校舍已不够使用，故又将娘妈庙（现在粮食加工厂旧址），也用作校舍，供学生上课和住宿。

阳春宾兴农校是由本县助学社团“宾兴局”出资举办的。设有学校董事会，当时的董事长是刘凤铎，董事有罗文川、刘琴友、陈鸿炎、刘传敬、刘传敬等。董事会干事是陈茂绩、肖永年、刘嘉肇等。董事会会址设在阳春城洗马街宾兴局。（当时宾兴局共管理田租三千多担，该项田租是由全县各姓祖尝和各方人士赞助作为文化教育方面公用的。因此，田产遍布全县。当时宾兴局每年收回的租谷，一般是存放在本城的几间米铺。宾兴局拨给农校这部分稻谷，除供教师工薪和学校各项费用开支外，还拨出部分作为学生的助学金。当时校长每月工薪七至八担稻谷，教师每月工薪五至六担，职员月薪三至四担，工友月薪二至三担。）

宾兴农校第一任校长是区光南，大学毕业，在任只半年。第二

任校长是梁荣勋，广东国民大学毕业，任职至解放前夕。解放后先由刘奇任校长，他是广东肇庆高级农校毕业，任期仅半年。后由李希略接任，他是广东国民大学毕业的。该校最早的一批教师是刘传绅、梁宗荫、黄庆云、叶桂松、伍鲁、施宝成、刘经富、李希果、游兴豪、黄昭殷、梁荣燕、谢公惠等。后来有梁翥云、何炳焕、丁灏泉、叶其球、黄云程、李湘涯、刘海琪、姚灿殷、刘文昭、梁本笃、刘奇、梁震坤、陈始亮、刘苏、裴彬等。再后是黄雷祥、莫宝湖、邓绍球、刘光地、周均泰、曾昭晋、李孟植、韦鼎旭等

一九四四年秋至一九五〇年，校名是“阳春县私立宾兴农业技术学校”，一九五〇年秋改为“阳春农校”，后来我省中专学校实行调整，该校于一九五四年秋停办，将在校学生归并到电白农校就学。办了十年的宾兴农校，先后培育出不少人才，全国有名的植保专家林举儒（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还有现在县内外各地担任领导工作的农艺师如陈乃楷、陈宏锵、邹鸿铨、黎清权、林荣光、黎运枢、曾宪辉……等等都是从该校毕业出来的。

注：“宾兴”原是科举时代地方设宴以待应举之士，有奖励教育的意思。

抗战前的阳春留省学会

刘文昭

一九三五年，阳春县籍赴广州读书的大、中学生大概有二百人，其中三甲区的有将近五十多人。潭水区的有五十多人。春湾区的有二十多人。合水区的有二十多人。春城区的有二十多人。岗美区的有十多人。当时阳春县宾兴局拨有一定的学费补助留省学生，各区也有部份的补助，对学生的学习经费还算重视的。当时春湾区的大学生有罗官盛、罗官奇、罗荫清、罗宝瑚等人。合水区的大学生有欧立权、欧立楷、陈鸿飞。中学生有陈德桓、高逸朋等人。春城地区的大学生有陈孟燮、刘秀珠、刘廷治、刘廷济、游雪影、陈孟轲。中学生有陈礼嘉等人。三甲区的大学生有刘显宏、刘经富、刘貽薰、刘经治、刘貽虎、刘光地、刘经天等人。潭水区的大学生有刘显泽、范乃震、范乃伦、范家端、刘其濬、吴其全、吴宝文、林以琪、刘传黎等人。岗美区的大学生有林举铨。中专生有李孔果、李丽华等人。

阳春留省学会，是阳春在广州读书人组成的，是一个群众团体，学会设有理事会，每三年选举理事一次。学会的经费，由阳春宾兴局拨出一定的款项开支，全县留省学生每年有一次集会，由理事会作工作报告，并举行全体学生聚餐。

一九三五年是理事会的选举期，这次被选为理事的：春湾区有

罗官盛、罗官奇。合水区有欧立权。三甲区有刘经富。潭水区有刘文昭。岗美区有林举铨、李丽华等人。

✓ 一九三五年阳春留省学会理事会出版了会刊《春潮》两期。会刊的封面第一期和第二期是相同的，封面的题材是春天的稻田充满了水，一位农民驾着一条大水牛在耙田。第一期有发刊词，声明本刊的立场以抗战为中心，希望抗日救亡运动有如春潮的到来。所以发刊词里写了“春潮”带雨晚来急的诗句。两期刊载的内容，都是以抗战为题材，如施来明写的《苦难的儿童》，黎殊写的《民族战争与解放战争》，李励写的《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等。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的学生疏散回乡，阳春留省学会就停止活动了。

当时的阳春留省学会，是附设在阳春留省同乡会内的。同乡会的会址设在广州市豪贤路万安里南约五号。现在是东风路万安里南约五号，同乡会会址的建筑面积大约二百多平方米，是一间旧式平房，内里设有同乡会和留省同学会的办公室、宿舍、还有操场一所，会址是阳春人民捐款及阳春宾兴管委会拨款，由阳春人刘风鐸先生经手买到的。据说房产契据于解放前已送回阳春宾兴管理委员会保管。解放后该会址因无专人管理房屋已被私人占用。

糯米石麻疯村惨杀事件

林 光、蔡李荣、荒 芜

糯米石位于合水圩之东三公里，在白牛塘边北岸。这里有很多石灰岩石。当地的农民有采石烧石灰的习惯，烧出来的石灰，除了自己用于建房屋作肥料下田外，还出卖搞一点经济收入。糯米石这块岩石烧的石灰，与别的岩石烧的石灰不同，它洁白如糯米粉，与水溶合后粘性也很像糯米粿，故此，当地人取名叫它“糯米石”。

清朝末年，糯米石已采完，变成一个有几千平方米的荒芜的大坑，成为当地的麻疯病人为了避免麻疯病的传染和逃避人们的厌恶，集中居住的地方。开始时，建有几间矮小的房屋，有十多个麻疯病人住在那里，后来就成了一条村庄，故名叫“糯米石麻疯村”。住在麻疯村的麻疯病人，生活非常之痛苦，患了麻疯病，无药无医，病情日益严重，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折磨已够痛苦了，在生活上也无法维持，因而带病去行丐，或种些生果和养一些生猪三鸟出卖为活。但这些产品，还要遭到人们害怕而禁忌，自己不能随便出入圩中买卖，只得靠亲属偷偷带到圩中出卖。在路上行丐要远离路边，人们才肯给点钱粮。到农村行丐，往往受人驱赶不准进村，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麻疯病在旧社会由于医药技术落后，被人们看作不治之症，历来使人害怕。农村中的妇女对不讲卫生的小孩恐吓说：“你不卫生，生了麻疯病就驱赶你去

米石麻疯村”，小孩听了都会害怕起来。

在无药无医的年代里，麻疯病人只有死路一条。患了麻疯病死了之后累及后代，他的后代还被人戒惧。解放前的民国政府，对预防麻疯病的传染没有什么办法，只得强迫群众凑钱凑粮在糯米石麻疯村多盖房屋，并在各处出告示通知，限期凡患麻疯病的人一律要到糯米石麻疯村集中居住，否则任何人可以把他打死而无罪。这样，合水地区的麻疯病人一般都到糯米石集中居住，一时，糯米石麻疯村就住上了成百个麻疯病患者。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一月，当时的广东省政府派人到新兴、阳春等县进行指使屠杀麻疯病人。阳春二区（合水）区长黄木允接到通知后，就阴谋策划集中屠杀糯米石麻疯村的麻疯病患者。一天，区长黄木允派人通知糯米石麻疯村的所有麻疯病人集中来合水区署，说什么要对麻疯病人进行治疗和救济等等，用花言巧语欺骗了全部麻疯病人来合水区署，请他们吃了一餐饭，有烧肉、烧饼、烧酒、粉、饭等食物，吃完后即叫他们回去糯米石等候治疗。当麻疯病人高高兴兴回来时，刚进入麻疯村，就遭到黄木允的伏兵集中枪杀。枪杀后，全部尸体埋在一个事前挖好的大泥坑中并撒上石灰粉埋掉。有两名未知情况的平东背岭村麻疯病人刚来到麻疯村，同样遭了枪杀。有一个春湾自由乡高村人名叫高五的因祖父患了麻疯病，也不放过而被杀害了。这次惨杀事件总共杀害了麻疯病人五十多人。当时在农村中的麻疯病人，由于害怕被枪杀，逼得又自杀了二十多人。这些麻疯病患者只是有病并没有罪过，却要遭到集体杀害而死，真是骇人听闻的一宗大惨案！

糯米石麻疯村被烧光了，麻疯病人被杀死了，但麻疯病靠屠

杀是不能消灭的。在缺医少药的旧社会，杀了这一部份病患者，又会有新的病患者产生，是永远杀不灭的。只有今天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民政府大力开展医疗卫生工作，科学地进行对麻疯病进行防治，办了麻疯病院，医治好很多麻疯病患者，使他们身心都恢复健康，这才是一个好办法。

苏 广 入 山 概 述

永宁 区志编写组

民国十六年丁卯岁（公元一九二七年），农历十一月十一日，贼首苏广协同贼帮温良臣、刘北、李五叔、范利儒等，五股贼帮共一千三百多人入劫永宁圩，俗谓“苏广入山”。

他们由陂面经飞鹅头，到新坡大茆住了几天，直上那离，进入永宁圩驻扎。往林湾抢劫时，在塘面烧了冯广兴之屋，在长塘烧了钟元计、钟石金之屋。往造和抢劫时，烧了江明深、黄木水以及黄星朗在造和之旧屋。往石莱抢劫时，又烧了黄星朗在大秧地的新屋。

黄星朗原来也是贼头，后接受阳春合水联团的招抚，带兵打贼，在永宁牛围河口伏击苏广，于是黄星朗就成为苏广的死对头。

苏广入山，为害甚大。当时当地人民纷纷起来组织民团，抵抗苏广贼帮，迫使苏贼撤退。一九二七年农历十二月十二日早，苏贼退出永宁，焚烧了永宁圩的德和、荣新、广兴、会昌、义隆、以及

打铁铺等十二间铺，烧毁杉木一万二千多枝。撤退到那离时，又焚烧那离群众的房屋，从坑口到坑尾，数十间房屋被烧毁。

为抗苏贼而牺牲的民团，在永宁圩尾下坳仔纪念碑留名的有铁垌曾四等十一名。有两名群众被苏广贼帮生擒，然后将生擒者四肢伸开，钉在木架上，泼煤油活活烧死。

永宁圩尾下坳仔的纪念碑，于公元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时被毁。

抗日时期流徙合水圩的四邑难民

洪荒忆述

我十多岁时，在合水圩四乡（高南、高北、平坦、南在）联立中心小学（简称“四联小学”）读书。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年纪虽小，但记忆很深刻的事，是四邑难民流徙合水圩的情景，时间虽然过去了四十多年，但如今记忆犹新。当时，广州市、江门市、四邑（台山县、开平县、新会县、恩平县）的部份地区都沦陷于日本侵略军铁蹄下，阳江城也曾被日军进攻过，我们阳春是山区，日本鬼子从未到过，成了粤中地区唯一的小后方。因此，已沦陷的四邑各县群众纷纷逃来阳春避难。当时我县合水圩仅有商店、住户一百多间，人口只有千多人，但是拥到合水圩小小街巷里的四邑难民就有二三百人之多。那时，不管四邑那个县来的难民，当地人叫男的做“三埠佬”，女的叫“三埠婆”。

难民来来往往，行丐于合水圩和附近农村之间，个个惊魂落魄，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手脚浮肿。他们栖宿于圩亭、破庙，方便所（专门给无屋住的人住）、大小便厕所、烂砖瓦窑，烂灰窑等处。民国初期间匪乱，合水圩曾建筑城堡同时建了三个门：东门、南门、北门。三个门都建有炮楼。这时，三个炮楼底下成了难民群集栖宿的地方，连东门外侧一个小小的“次崑纪念亭”也住了几十个难民。难民栖宿之所，夏不能避雨，冬不能防寒，真是惨不堪言！

四邑难民流徙合水圩，初时还带有点衣物和首饰，他们为了维持生命，很快以低价出卖光了。他们一无工作，二无田耕，三无其他经济来源，卖完衣物首饰，便靠行丐度日。由于行丐求吃的人多了，圩民难于应付，难民就采吃野生植物和捡些非常肮脏东西来充饥维持生命。在饥寒交迫，无医无药的情况下，难民死亡枕籍。一九四三年发生了霍乱病流行，每天就有成批难民悲惨地死去。有的死在圩亭街道上，有的死在路边，有的死在临时栖宿的几个炮楼底下和破庙里。一夜过去，第二天就在各处收埋十多个难民的尸体。那时，使合水圩负责收殓作（棺材佬）也感到心寒。我记得距离“四联小学”不远有个公共大便厕所，一天早上就发现有五具难民的尸首。有一次合水商会捐款在学校门前施粥救济难民，从早上就由同伙搀架着来到学校门前等候施粥，有的人没有等到粥吃就已经死去了，就在这一天共有十多个难民死在学校操场上。

难民初来时，可以看到他们携男带女，为了保存生命，只好痛心地把儿女送给当地无子女的群众抚养，特别是女孩，只以几斗米的代价，便卖给人家当奴婢。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难民带来的小孩死的死了，卖的卖了，渐渐很少看到带有小孩的难民，只剩下

一些瘦弱的中、老年的妇女。那些年青的或者身体比较好的妇女，都投身到农村去做人家的妻妾，以保存自己的生命。一些还有点能体力劳动的男人则到合水圩附近斩柴卖给石灰窑或担灰石挣工钱来维持生活。难民青年周燧年在合水圩附近的辣垌灰窑担灰石，被人发现他有文化，就被推荐到合水“四联小学”任教师。象这样的人只有极少数，绝大部份难民是在悲惨苦难中挣扎着。抗日战争时期，为什么四邑人民纷纷逃难来阳春呢？我想，其主要原因是：

一、四邑是侨乡，绝大部份男人出海外做工或经商谋生，只留妇孺老弱在家，同时他们靠侨汇过日子，日本侵略中国侨汇断绝，使侨属生活毫无出路，他们是为了逃生而来的。

二、家乡遭到了日本飞机轰炸或被日军侵占，而失散了的人便跟随着别的逃难人群而来的。

三、沦陷区许多青年妇女和小孩被人贩子拐骗而来的。

四、阳春是山区交通很不方便，日本军队未到过，人们便认为阳春平静，可以避难谋生。阳春又是四邑毗邻地区，故此，来的难民大多数是四邑人。

为什么逃到阳春的人竟死亡这样多呢？主要原因是：

一、国民党阳春地方政府不管难民死活，县、区、乡无人组织难民进行生产自救。有些政府官员不但不同情帮助难民，反而欺负难民，如高南乡长杨仰斋（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处决了）对一个恩平县来的难民林炳的妻子随便枪杀。

二、流难来的难民数量庞大，当地商会、善堂虽然搞过施粥救济，但杯水车薪，无法解决问题。上级政府拨来的小量救济款，又